

略论司汤达的《红与白》

包承吉

在我国，人们对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杰作《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非常熟悉，而对他的另一部作品《红与白》却不甚了解。如果说，副题叫做“一八三〇年纪事”的《红与黑》是因为对王政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作真实的描绘而受到注目的话，那么，作者在《红与白》中以同样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真实感再现了由大财阀统治一切的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由于司汤达在这部作品中对资产阶级民主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揭露与批判，由于这部作品所显示出的卓越精湛的艺术技巧，使得《红与白》象《红与黑》、《巴马修道院》一样，在文学史上占有不朽的地位。

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家作品的成就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这部作品是否真实而又深入地揭示了它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毫无疑问，司汤达的《红与白》确实是深刻地全面地剖析了七月王朝的社会现实的。

七月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法国历史的一个旧的进程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关于这个时期，马克思曾经指出：“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他的散文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①而在《红与白》神秘的序言中再次重申自己的作品“是一面镜子”的司汤达在这部小说中以具体的形象印证了马克思的论述，司汤达在作品中刻划的一个极为出色的金融资本家的典型人物是银行家娄万先生。这个人物是法国的真正主人。他可以操纵议会，决定部长的去留，连国王都怕他三分。有一次他兴奋地对儿子吕西安·娄万说：“我没有必要向权贵们或是他们的下属讨好。我所注意的只是他们的钱袋：每天早晨，我会在办公室里向他们证实这个道理：他们的利益和我的是一致的。”^②又有一次，老娄万先生因内政部长不肯提携他的儿子

吕西安，他便亲自来参加竞选，当他获得成功以后，他又纠集了一批新当选的议员向内阁发难，迫使内政部长就范，最后他们晋升了吕西安，并将勋章授予他。由于娄万先生在议员有莫大的权力，连国家元首通过一项法案也要取得他的首肯，而娄万先生则以撤换内阁作为交换条件。这位银行家十分明确地指出：“七月王朝以后，银行就成为国家的元首，资产阶级代替了圣日耳曼区的贵族，银行界又是资产阶级中的贵族，政府很需要交易所，内阁不能搞垮交易所，交易所却可以搞垮内阁。”^③司汤达通过银行家的这番话，揭穿了七月王朝的全部底细：“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路易·非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④

司汤达在深刻揭示出金融贵族是支配法兰西命运的主人的同时，还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七月王朝统治者内部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的黑幕。银行家老娄万先生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葛朗台夫人做了这样一笔交易，他可以让她的丈夫葛朗台先生当上部长，作为交换条件，葛朗台夫人必须充当他的儿子吕西安的情妇，并且由她替吕西安铺平将来进身的通道。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的不和引起了政治危机，但是老奸巨滑的财政部长深知钱能通神的奥秘，他批准了一笔国防定货，使得国防部长的儿子从中获得大量好处，于是双方握手言和，间隙全消。为了制造迫害工人的借口，一个名叫科尔提斯的军力特务受命扮成工人，假装酗酒闹事，去抢一个守卫桥头的新兵的枪，结果“科尔提斯受了重伤，糟糕的是他没有当场死掉，”内政部长非但见

①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293—294页。

②引自《吕西安·娄万》巴黎1937年版

③引自《吕西安·娄万》，第二卷，第61章。

④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396页。

死不救，反而想对他下毒手，因为他怕这个政治丑闻将传到社会上去。“这里，当你进入了内阁，就应将你的全部道德顾虑统统扔掉，就象进入军队的人将他们的爱国精神置之脑后一样，”司汤达通过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这样总结道。

然而，《红与白》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反映了奥尔良王朝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在于在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的动荡时期展出社会的新的分化和新的组合。司汤达用犀利的笔调令人信服地表现出：那些以金钱与物欲为准则的资产者们在资本竞争的恶浪中充分暴露了他们贪婪的阶级本性这种争权夺利的新的矛盾加剧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分化。在《红与白》里，在昔日的那场大搏斗中丧失了统治权的正统派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政治密谋，他们企图通过竞选议员来重新参政。而路易·菲力浦为首的金融贵族为了对付共和主义者，宁可和昔日的敌人——保王派的阴谋家携手合力。为了阻止共和党候选人富有的工业家梅罗培当选议员，内政部长派吕西安到外省去操纵选举，还专门嘱咐他不可与贵族、教士搞僵关系，并由政府提供十万法郎，推选一个保王党的候选人与梅罗培抗衡，而梅罗培则拼命笼络人心，他鼓动人民赶走了吕西安，并获得了选举的胜利。

如果说，路易·菲力浦为首的金融贵族与梅罗培为首的共和派的斗争在性质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那么，司汤达更突出的贡献是在小说中第一次表现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作者在小说中真实地描绘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们非人的物质生活，并深刻地揭示出了劳资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稍激烈的程度。小说的主人公吕西安在南阳随着他所在的团队去锡城镇压工人，但是在工人区他不由得为这些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极端贫困的生活而吃惊。作者以精微的笔触描写了工人的住房和周围的环境：“晾在窗口的汗衫之类都已破烂不堪，看上去令人作呕。窗上的玻璃又脏又小，许多窗户玻璃已经残缺，是用废纸或油纸糊的，到处是派凄惨景象，令人心酸。”①当吕西安的骑兵队全副武装地在夜晚对纺织工人进行“光荣的讨伐”时，愤怒的工人因为手无寸铁，便用污水桶与腐烂的苜蓝菜与他们作斗争。司汤达以一种讽刺的笔法描写了这个可笑的场面，他对金融贵族及其鹰爪们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和愤慨，而对被迫进行反抗的工人群众表示了真正的同情。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举出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当吕西安·娄万在一次决

斗中负伤，为他治伤的大夫劝诫他说：“您竟投靠到他们这种无耻的‘稳健’派中去！您为他们当兵，以后您还要为他们打仗。果然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到也好……但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呀，和这些快要饿死的穷工人作战，用些棍棒来弹压一阵，对你们来说，仿佛德朗斯诺南，街上的讨伐就是马伦哥战役了……”②这里所说的德朗斯诺南街的讨伐是确有其事的。就在司汤达写作《红与白》的几天之前，一八三四年四月，为了响应里昂起义，巴黎工人阶级爆发了狂风暴雨般的事变。政府派军队去镇压暴动，他们纵火烧毁住宅，扫射居民。其中德朗斯诺南街的屠杀尤其残酷野蛮。事实上大夫的这番话是画龙点睛之笔。在七月革命之后，作为路易·菲力浦王朝的一名外交官的司汤达自有难言之处，故而他只能通过这个持保守立场的大夫之口来一吐自己的心曲。这样一来，对N城镇压工人的场面的描写就决不是随意虚构的，而是作者对七月王朝的血腥暴行的愤怒声讨和无情揭露。

很少会有一个作家，能象司汤达那样，用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来从事创作。因为他决不是希图以自己的作品来讨好统治者，以谋取一官半职，他也决不想哗众取宠，适合庸俗的时风。他甚至觉得，他的《红与白》是写给后人看的，并准备在一九〇〇年出版这部小说。毫无疑问，《红与白》倾吐的是司汤达的肺腑之言，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跳动的是司汤达的一颗惨痛的心。

一个社会腐败到了这种程度，这个社会还会持续多久？如果我们读完了小说的前二卷，我们会感到吕西安·娄万的生活经历表现了司汤达的一种沉痛的幻灭感和失落感。司汤达曾这样说过：“七月王朝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坏政府，有可能在最短期间被推翻，如果我们还能活几天的话，我相信我们将看见波拿巴特家族的某一个人上台，因为不管怎样帝国在法兰西留下了很深的痕迹”③。司汤达这番话表明，他本人就是一个七月王朝的贰臣逆子，无怪乎他要创造出吕西安·娄万这样一个人物来。

①引自《吕西安·娄万》第一卷，第27章

②引自《吕西安·娄万》

③古董商布齐于1857年1月7日写信给整理司汤达遗作的科隆（1784—1858）（回忆司汤达领事期间的生活。引自《司汤达俱乐部的晚会》第一集（巴黎1905—1908）

事实上,吕西安是又一个于连式的人物。如果说,作者通过后者敲响的是波旁王朝的丧钟的话,那么作者通过前者宣告了奥尔良王朝末日的来临。

真实而细致地表现出形成吕西安失落感的全部社会内容,再次证实了司汤达所具有的异常锐利的历史洞察力。与出身低下的木匠的儿子于连不同,《红与白》的主人公吕西安是大银行家的儿子。而这种社会地位的改变本身就具有很大意义。它清楚地表明,作者的聚焦点已经突入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固疾。就表现金融贵族罪恶而又虚弱的本质特征来说,吕西安这个人物显然更为典型。

司汤达笔下的所有青年主人公几乎都是思辩型的,吕西安也毫不例外。在一连串秉承父旨而投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中,吕西安不断地陷入不可自拔的思想危机。吕西安在工科大学学习时,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有一天学校禁止全体学生外出,他却不识好歹去散步,正好赶上了一八三四年的一次工人起义。在南锡二十七长枪骑兵队当少尉时,他仅仅因为买了一本书便遭到上司马勃上校的训斥,而这个昔日的拿破仑军官却要他通过征伐手无寸铁的工人来建立功绩,这使他感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当他抛弃军职,听从父亲的意见,进入政界充当内政部长的秘书时,他再次被迫去做各种违心的事:他协助显贵抢劫国库,他利用金钱封住垂死的科尔提斯之口,替内阁掩盖罪恶,他受命去外省参与竞选阴谋,他不得不和交际花葛朗台夫人鬼混,以谋求自己的发迹。然而这一次又一次作恶却在不断地加深着他对周围世界的怀疑。

在吕西安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上,他的父亲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表面上来看,他似乎很爱儿子,当吕西安被学校开除后,他立即在军队里为儿子安排了位置,当儿子脱离了军伍生涯后,他又忙不迭地利用特权为他进入政界铺平道路。然而,司汤达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正确地表现出娄万先生的爱子之情最终是受他的阶级偏见所左右的。父亲要儿子信奉的完全是他自己阶级所奉守的道德信条,他所期望儿子是象他那样成为法国社会真正的统治者,他唯一担心的是儿子在从事这种“高尚的职业”时不够无耻卑劣。儿子的忧郁、痛苦使他感到恐慌:“他不是为现今这个时代而生的,他至死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好人罢了”。为了不让儿子脱离轨道,他一次又一次给儿子注入强心剂。然而老婆万的一片苦心只收到了相反的效果,而吕西安所经历的种种社会教育终于使他幡然醒悟,看到了自己阶级的不义

和罪恶。在小说的第二卷末尾,司汤达描写了吕西安最后抛弃了财产和地位,只身去意大利寻找爱情与幸福。司汤达安排的这一结局清楚地告诉人们:以尔虞我诈、互相残杀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不可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它同时也表明,在一个既邪恶又混乱的资本主义的所谓新秩序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吕西安这个人物还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意蕴,我们有必要提一下一本司汤达写于一八二五年的小册子《论反对工业家的一个新阴谋》,法国作家阿拉贡认为,这本小册子“通过谴责查理第十时代的小说《红与黑》,已预示出抨击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小说《吕西安·娄万》”^①。我们不妨摘引其中一段文字

做银钱买卖的人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否则他就会失去社会的信誉,但是一朝有利可图,银行家就不顾一切了,至于我们,我们心中不会这样健忘:人们就是靠二十家做大买卖的企业慷慨贷款,才收买了里埃果^②并把他吊死,……工业家们是作为法国公民而运用他们的自由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们的资金,这就很好,但是为什么要我来加以‘赞赏’呢?而更可笑之至的是,要我用爱的自由的名义加以‘赞赏’!^③

司汤达的这番话是针对曾将廉价的自由桂冠奉献给资本家的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他认为圣西门等人将单纯的生产效率强调得太过份了,而且他发现圣西门主义者与其他改良主义者是教条主义的和不切实际的。而十年之后,司汤达更清楚地看到了圣西门的空想主义彻底的破产,因此,他在圣西门的信徒吕西安身上完成了同样的思考:“难道我命中注定必须在迷恋旧时的狂妄的利己主义者(保王党人)以及向往未来慷慨却又令人憎恶的蠢货(共和主义)中间度过我的一生吗?”这种进退两难的特征分明是来自对他昔日信奉的圣西门学说的根本性的怀疑。这样,司汤达在吕西安身上实现了对圣西门主义的再度否定,尽管他用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④

吕西安这个人物的深刻意蕴还表现在他的忏悔

^①《论司汤达》,《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第2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②西班牙的爱国志士;后为斐迪南七世捕杀处死。

^③《论反对工业家的一个新阴谋》(巴黎1937年版)。

^④他向英国读者介绍《生产者》时,曾说过圣西门是“次于边沁的一类人”。(《伦敦杂志》1825年11月)

特征上。很少有作家会象司汤达那样在作品中表现出如此显著的忏悔特征。毫无疑问，在这方面只有托尔斯泰才真正超出了他，特别是那本伟大的杰作《复活》，在《红与白》之前，司汤达曾在《红与黑》中描写了农民的儿子于连·索黑尔的忏悔，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于连狱中自白的描写，然而，在《红与白》中，这种忏悔特征变得更加明显。可以说，整部作品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主人公深深的悔恨它表现在南锡的军伍经历里，表现在巴黎的官僚生涯里，表现在两次截然不同的爱情波折里，也表现在对父亲的一再屈从里。如果说，于连的忏悔是因为德·瑞那夫人真挚的爱情引起的，是一种对自己个人行为沉痛自责的话，那么，吕西安的忏悔却是另一种形式的：这种忏悔和他所经历的这场危机紧密相联，事实上，这种忏悔不只属于个人，它的结果是引起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真正怀疑，一个青年人经过社会的人生教育后，开始背弃自己的阶级，并反抗这个社会，司汤达正是希望用这一事例来揭示这个阶级没落与衰亡的不可避免性。

将个人的忏悔变成一种控诉，这在文学史上也不是绝无仅有。司汤达所喜爱的法国作家卢梭早在1778年就写过一本《忏悔录》，这也是一本名为忏悔，实为控诉的小说。卢梭在书中宣扬了著名的人性论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化。然而，作为宣传和表现启蒙思想的工具，《忏悔录》在对封建主义的罪恶进行深刻揭露的同时，还用一种偏激情绪倡导着极端的个人主义，而吕西安·娄万忏悔的真正意义。正好就在于对这种个人感情的放纵进行一种深刻的批判，而且，司汤达又是在一种非常具体的真实关系中来展现吕西安是如何认识到个人感情的放纵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的，这一切正是司汤达超出他的前人卢梭的地方。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还应该提一下缪塞的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缪塞是司汤达的同时代人，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正好发表在一八三六年，也就是司汤达写完《红与白》前二卷后的二年，缪塞小说的主人公沃达夫也是一个“投生恨晚”的人物，当拿破仑的时代为过已成去，个人奋斗的道路已经堵塞，情人与朋友又先后弃他而去时，沃达夫也经历着一种惨痛的精神危机。最后，当他将纯洁、温柔、美丽的比莉斯看作自己的救星，希望在一场真挚的爱情中治愈自己的创伤时，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绝望的怀疑再次支配着他的感情，他终于离开而忠实于他的情人，陷入到新的迷惘之中。事实上，司汤达与缪塞的主人公都

患着一种“世纪病”。所不同的是，按缪塞的解释，它是青年一代的“无可名状的苦恼的感觉”，而在司汤达看来，这种病症并不是无可名状的。在吕西安屈辱的经历中，司汤达异常准确明确地为这种病症作了诊断。而且当缪塞仅仅将沃达夫的痛苦的经历表现为爱情的悲剧时，司汤达却让他的主人公经历更为纷繁复杂的人生，接触更多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从而更加广泛深入地揭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现实生活的本质。最后，当吕西安的忏悔是一种觉悟，是一种努力摆脱异己力量的自我净化，是一种对“成为一个你自己”的严肃思考时沃达夫的悔恨却是一种新的危机的开始，一种无尽的烦恼与空虚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评论家曾一再指出，俄国作家所创作的“多余的人”与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有着渊源关系。他们还特别指出了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毕巧林与缪塞的沃达夫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人们恰恰忽略了，司汤达的吕西安·娄万却是这类人物中最早的也许是最杰出的典型。

三、

《红与白》并没有最后完成，因为司汤达想回法国去收集更多的关于七月王朝政治内幕的材料，作者暂时中断了写作。后来因身患重病，他终于没有继续写完这本书。然而就小说业已完成的前二卷来说，司汤达已经显示了一种极为精湛的写作技艺。

司汤达杰出的艺术才能首先表现在对作品情节结构独具匠心的安排上。如果和他的前部小说《红与黑》相比，我们发现，《红与白》有着许多新的特点。在《红与黑》中，司汤达想要说明的全部问题是一个农民出身的青年、一个低贱的平民为了宣布自己也有享受生活乐趣、得到幸福的权利，起来向富有的特权者阶级作斗争，而特权阶级则为了使他们享有的“特权”，不受侵犯便杀害了这个无畏的挑战者。很显然这一对矛盾是互为前提、互相依存的，而司汤达也正是通过这种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的关系来安排小说的情节结构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向的情节结构，这种情节安排对于表现一种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是极为有利的，而《红与白》的结构是一种串联式的结构，或者说是一种外向的结构形式。在这部作品中，司汤达让小说主人公吕西安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生活的考验，并以此为线索，让主人公结识了形形色色的贵族、资产者、军人、交际花、国王、大臣、密探和鹰爪，从而展示了一幅极为广阔的十九世纪法国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这

种结构形式会使我们想起西班牙佚名作者的《小癞子》、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和英国作家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但是这些作品往往缺乏艺术的整体性，给读者一种松散拖沓的感觉。而司汤达的《红与白》却巧妙地克服了这种流浪汉体小说固有的弊端，作者力求在典型化的高度上来安排事件和描写人物，并且在描写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和人物时，十分注意揭示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红与白》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小说中出现的次要人物决不是挥之即来，斥之即去的可以随意取代的傀儡，而是具有各自特征的艺术形象。因此，司汤达的艺术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而这种艺术实践后来又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更加完美的发展。

妥善地处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将典型化看作是创作的根本原则，这是《红与白》的又一贡献。诚然，司汤达曾主张，他的作品就象镜子一样照尽人间一切。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将直观地机械地照搬生活中的一切，司汤达最关心的永远是十九世纪法国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就象他早先在《红与黑》、《阿尔芒斯》中将波朋王朝复辟时代作为描画对象那样，这次司汤达是要照出奥尔良王朝的腐朽没落的社会风貌的道德习俗。司汤达在写这本书时用了许多书名，除了《红与白》之外，还有《紫与黑》、《绿衣猎人》、《电报》、《吕西安·姜万》这些书名也包含着作者的良苦用心。《红与白》是两种敌对的政治势力的象征，《紫与黑》则是小说主人公吕西安军服和官服的颜色。《电报》寓意着工业化新时代带来的极度贫困并由此造成了工人们频繁的暴动。

司汤达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典型环境中来描写他的人物，因此，在《红与白》中吕西安的全部思想情绪，他的阴郁、犹豫、矛盾、悔恨的心理显得那样真实可信和富有时代的特征。作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儿子，司汤达信奉的是决定论，亦即十八世纪唯物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恶行是政府的缺陷造成的”。实际上《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也是这种思想的产儿，然而《红与白》的创作表明，司汤达在承认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同时，还提出了人可以反作用于环境。吕西安的忏悔、自责到最后和自己阶级的决裂充分证明司汤达在用一种辩证的能动性来补充或修正他的决定论。吕西安的来意大利生活为他性格的充分展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作者毕竟没有写完第三卷，这确实是十分遗憾的。但是无论如何，吕西安决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人物，而是一个极富有进取心人物，而这自然完全应当归功于司汤达的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司汤达在《红与白》中还显示了多方面的描写才能。如在小说第一部第二十六章中表现的讽刺手法：吕西安的团队听说N城工人闹事，便在凌晨四点倾巢出动为了对付赤手空拳的工人，他们如临大敌，还带着重型炮车，然而在N城他们一无所获，只有穷街陋巷和臭水浜在迎接他们，只好空手而回。此外，司汤达善于用明快、简练的白描手法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用“反意联结”的修辞手法来揶揄奚落，用清晰、准确的叙述描写来烘托气氛，这些都给他的作品带来了一种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